

# 社會鑲嵌與本土化研究－ 以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研究為例\*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已經有一段時間，但是一些過去被提出來的問題依然存在，例如社會學理論在研究方面的應用或對「本土化」這個名詞本身的意義仍有疑義。針對討論多年卻還沒有得到充分解決的問題，本人認為應該從社會科學知識的整體性來檢討，例如從本體論，方法論以及研究方法與知識的性質及其應用等各層面一起來分析，方能徹底釐清本土化的議題。本文因為篇幅與時間的關係，僅僅針對本土化研究相關的議題，以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相關之經濟社會學研究為討論對象。針對經濟社會學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意義及其啟發，本文分成四方面來討論：(1)在社會的性質方面：以 P. Bourdieu 的觀點，從場域與慣習的角度來看待社會，個人、團體與制度在不同場域關係中的動態變遷，而不用實體或規則的實證觀點來看待社會。因此本土化也不是掌握一個社會的本質性或一個社會的本來的面貌，而是掌握實做邏輯；(2)在經濟活動場域的分析中，社會鑲嵌性所指涉的是經濟活動的社會基礎或社會關係，說明了不同社會具有特殊經濟活動的理由，經濟活動的制度化基礎之分析的理由與本土化研究的主張不謀而合。而「去鑲嵌性」，則說明了經濟與社會的異化，同時也可引伸解釋為理論與社會發生異化，甚至於扭曲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之問題，理論必須鑲嵌於社

---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 (NSC 89-2412-H007-003)，初稿發表於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屆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研討會」。感謝鄭陸霖教授，以及期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意見。

會，這正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3)以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具體例證，來說明本土化研究的進行。其他社會的閱讀，無害於並且有益於本土化的努力，但既有理論、概念與框架在進行研究時，需要有某種程度的「擱置」與反省；(4)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主要以經濟社會學中質化研究的相關素材為例，說明其本土化研究的努力。

關鍵詞：本土化研究，理論與研究，鑲嵌性與去鑲嵌性

## 一、前言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世界各地討論的學者已經很多，開過的會議也不計其數，針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爭議這個議題，我們曾經以台灣社會科學界的論辯為軸線，指出強調文化邊界的浮動性、重新發現社會實體的性質和文化比較研究回歸日常生活等，對本土化議題的討論所具有的意義（張維安、楊凱成，1998）。<sup>1</sup>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議題，如果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召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研討會」（民國69年12月21日至24日）算起，可以說已經20年了。20年來雖然有許多變化，但是也有一些過去討論過的問題，今天還繼續存在，例如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論文集的序言中，楊國樞與文崇一（1982：i）兩位先生曾經提到：「多年以來，我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界，一直忙於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經忘記將自己的社會文化背景反映在研究活動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與自我信心的情形下，長期過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動的結果，使中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缺乏個性與特徵，終於淪為西方社會及行為科學的附庸」。這一段反省的文字至今仍然重要，它說明了如果未經反省的從西方理論出發，那麼本地的經驗研究只能作為西方理論思考的註腳，對西方社會的理論也許有所啟發，或者成為西方理論的異例，即使有所貢獻，卻也只是貢獻於西方理論的驗證與否，通過他來認識自己的社會，不但失之於片段甚至於會造成扭曲。

以韋伯社會學理論和中國社會的關係為例，由於韋伯的理論是以關心西方社會發展為主要思考線索，在諸多跨社會的比較研究分析裏，雖然也對於其他社會有許多深入的分析，但是終究是要回到西方社會的解釋上才有意義。他對中國社會的觀點，不能說對中國社會的了解沒有幫助。但是據之以瞭解中國，

---

<sup>1</sup> 本文不擬重複「文獻回顧」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張維安、楊凱成（1998）。

或者從這個理論進一步檢查中國到底有沒有入世禁慾的精神，或者中國是否有中產階級，儒家倫理是否重視商人，或者中國社會的非主流思想是否和商業經營的發展有所違背，這些討論可以說都是在韋伯議題的陷阱裏打轉（張維安，1995: 161）。韋伯論中國的觀點，不能說和了解中國社會無關，但是我們無法從西方社會理論變項出發，來檢查中國社會裏有或者沒有某一個變項，而深入的認識這個社會。相同的，從西方社會理論出發，在本地進行經驗研究，也有類似的限制。<sup>2</sup>

這樣的反省、思考和憂心，在過了將近 20 年後的今天，仍然困擾著關心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學者。這段陳述頗能表達這層關懷：本土化的問題，不應該「只是」在本地作經驗研究的問題，過去若干年來許許多多所謂「本土化」的研究，大多是直接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尤其是實証的方法）來探究中國本土社會。他們對於這些理論和方法背後所隱藏的西方人的世界觀與身心狀態，不是毫不反省的接受，就是有意加以忽略。這樣，所謂「本土化」，大部分的情況只是西方霸權理論延伸至中國本土社會的現象罷了（鄒川雄，1999：9）。由此可知，本土化研究不能夠不反省所使用的理論、方法、概念架構，乃至於界定問題意識的出發點。沒有經過反省，直接的從西方理論出發，甚至於順理成章的拿其他社會的理論來詮釋我們的社會，都需要進一步加以反省。未經反省的直接從西方理論出發，就是「把整個人類文明予以平面化，而且是極其僵硬的平面化。這不但把科學方法與邏輯獨裁教條地供奉起來，而且根本窄化了人類社會所具最可貴的特性。這個特性即是：因為生活環境的種種條件不一樣，人們所想、所感、所視、所為的，常常也是不一樣的。這體會在社會裏的種種，自然也就會使得『同』中充滿將更多的『異』。而正是這些『異』值得我們特別加以關注，也是需要探討的關鍵意義所在。」（葉啟政，1999：3）簡單來說，本文認為本土化研究必須注意到社會的特殊性，掌握這個社會中個人的世界

---

<sup>2</sup> 進一步論述請參考 “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Negative Questions i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Research.” (Hamilton, 1985).

觀、身心狀態以及行事邏輯。而不是一味的以漂亮的理論，套在本地的社會現象上來解釋。

過去許多年來，本土化研究其實已經累積了一些成果，例如前述鄒川雄（1999）的「中國社會學理論」，蔡錦昌（1989）的「從中國古代思考方式論荀子思想之本色」，黃光國（1988）的「中國人的權力遊戲」，更早期的費孝通（1948）的「鄉土中國」，<sup>3</sup>以及翁之鏞（1952）所著的「中國經濟問題探原」都具有本土化研究的色彩。回顧社會科學所作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說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其實已經累積了一些成績，下文將要討論的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研究的案例，可以算是本土化研究的一個範例，本文所採用的幾個研究案例所分享的理念，進行研究的方式以及所提出的研究成果，都與本土化的理念具有親近性，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討論具有啟發性。

針對「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作為本土化研究的一個範例」，下文分別從四方面來討論：（1）重新看待社會實體，本文認為看待社會實體的方式，將會影響對於本土化研究的論述與主張，本文將借用 P. Bourdieu 關於「場域」的觀點來重新看待社會實體，指出社會由關係所構作；（2）在經濟活動場域的分析中，K. Polanyi 的鑲嵌性觀念，具有重要的意義。鑲嵌性所指涉的社會基礎或社會關係，說明了不同社會具有特殊經濟活動的理由，K. Polanyi (1992) 主張的「經濟作為一種制度化的過程」的觀點，有助於說明經濟社會學與本土化理念的親近性。他在關於「市場經濟」之發展所提出的「去鑲嵌性」，除了說明經濟與社會的異化，同時也可引伸解釋為理論與社會的異化。理論必須鑲嵌於社會，這正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3）理論與研究：發展性策略。將探討理論與研究之間的關係，並以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的研究為對象來加以說明；（4）網絡關係與經濟活動，則從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相關研究，取材來說明其對本土化研究的努力意涵。

---

<sup>3</sup> 關於費孝通和中國社會學的討論，請參考 Hamilton and Wang (1992) 在「鄉土中國」的英文版導讀的分析。

## 二、場域：重新看待社會「實體」

人們對社會的假設，會影響到社會研究的方法、目標，也會影響到對本土化的看法。本文反對本質主義，也不同意實體主義，並且認為從「場域的概念」重新看待社會實體，是一個可能的出路。個別社會的研究，雖然也具有貢獻於全人類社會之通則或規律之形成的意義。但是本土化卻是強調另一個面向，本土化，最少具有一層意義，那就是對於在地實際運作邏輯的掌握。但是所謂在地的特色卻是一個相當有爭議的議題。例如，一個社會經過外來文化的衝擊，原先社會的特色已經漸漸的不清楚，後來經過重建，又發展出一種「新的」社會的型態，面對這樣的情形，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目標是擺在針對那一段的了解？本文對這個議題的觀點是如果社會脈絡實做邏輯的了解是社會科學研究底目的，那麼無論如何必須排除本質論的觀點，也就是說不能假定某一個社會經過外來文化的衝擊之後，已經失去了它「原來的」樣貌，並且進而主張本土化就是要把這些外加的、外來的（與後來的）影響加以剝除，以呈現該社會原有的、未受影響的、具有在地（原味）的特色，如此一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目標似乎便是在於掌握一個社會的本質性特色。如果這樣，那麼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研究，將會無限的朝過去追索、還原、倒退。

基本上，社會本質論的看法，和掌握一個社會的實做邏輯，雖不是不相關卻不是同一件事。尤其是所謂一個社會的本質，可能根本就是無法掌握的課題。本土化除了要避免本質論此外，也需要避免社會實體論。社會學的創立者，在創立社會學之時已經宣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於把那些社會現象「當作社會事物」來看待，「社會實體」概念之使用，<sup>4</sup>可能和這種想法息息相關。「社會事務」被當作「社會事物」，多少是因為受到實證科學的影響。在這種自然學科的

---

<sup>4</sup> 雖然 Reality 並非只能翻譯成實體，例如，也可以翻譯成現實，甚至於翻譯成事實。在中文裡將 Social Reality 翻譯成社會實體，是經常有的現象。請參見鄒理民（1991）所翻譯：社會實體的建構。

觀點下，相對應的方法和技術也就紛紛地被提出來，例如對於普遍性法則的掌握，歸納通則和建構理論，在這種情形之下邁向一個普遍的法則，便成為社會研究的基本目標。但是，如果我們認為社會是由一張一張人與人之間，人與制度之間的互動所組成的意義網絡，人際網絡權力的消長，那麼針對意義脈絡的詮釋以及場域內實作邏輯的了解便會成為主要的目標。相同的，如果從批判社會學的觀點，那麼社會科學研究的任務可能又不相同。這些似乎並不只是一個經驗性的議題，我們對社會的性質做了什麼假定，它便會影響我們進一步的使用、或者發展相關的技術，乃至於看到某些特別的社會事實，而忽略其他的現象。

本文無意詳細討論「社會究竟是什麼」的各種論述與主張，我認為如果沒有具體的行動者，以及行動者所承載的意義，還有長時期以來人們所創造的制度，那麼「社會」基本上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人與人，人與團體，人與制度之間種種的互動，共同構成人類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的基礎。進一步來說，社會乃是由這些人、團體與其生活的環境的種種互動與關係所構成。P. Bourdieu 以場域和社會空間的觀念來說明社會的方式有助於申論本文的主張，每個場域都規定了各自特有的價值觀，擁有各自特有的調控原則。這些原則界定一個社會構建的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裏，行動者根據他們所佔據的位置進行著爭奪，以求改變或力圖維持其空間的範圍或形式。這個定義有兩個關鍵的特徵：「第一，場域是諸種客觀力量被調整定型的一個體系（其方式很像磁場），是某種被賦予的特定引力的關係構型，這種引力被強加在所有進入該場域的客體和行動者身上。場域就好比一個稜鏡，根據內在的結構反應外在的各種力量。場域同時也是一個衝突和競爭的空間，這裏可以將其類比為一個戰場」（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7-18）。

對 P. Bourdieu 來說，若將實體的概念推到極致便是沒有實體的境界，沒有實體的命題也是一個本體論的命題，但是一個預存認識和存在的二元論將會妨礙無實體的本體論和認識的實作之間的連結。不過 P. Bourdieu 對知識論上構建

出來的社會世界有一種樂觀的態度：「這些社會空間，雖然只能通過高度抽象的客觀關係來顯示自身，而且我們既不能觸及到他們，也無法『指出他們』，但是他們仍舊構成社會世界的整個現實。」（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8：353）事實上，P. Bourdieu 根本沒有肯定實體的存在，只是不斷的強調社會世界必定是「關係當中的現實」（引自蕭旭智，1999）。

蕭旭智（1999）指出，P. Bourdieu 強調將實體的概念轉化為關係的結構，場域和慣習都是一些關係束的集合，而關係束的結構有其構成的原則。「場域並非一個僵死的結構，或空洞的場所的集合，而是一種遊戲的空間。這種遊戲的空間只有在下述意義上才存在，就是那些相信他所提供的酬賞並積極尋求這種酬賞的遊戲者投身於這一空間」（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9）。「場域」概念替「關係的分析」提供一個架構，在場域概念之外另外還有多樣並且可以轉換的資本（社會，象徵，文化與經濟）。場域的結構乃是行動者之間以及介入爭奪的制度之間力量平衡的狀態，或者說是引導未來策略的特殊資本（在上一次的爭奪中所累積下來的）的分佈（Calhoun, 1993）。社會學家應該要掌握個人或團體在不同位置、擁有的不同資本、不同的慣習和性情傾向中的相互關係構成的一個社會本體的存在狀況。社會並非如「物」一般的驚自存在，社會由場域之中的關係所建構，各種場域都將自身體表現為各種可能性，即使是那些充滿各種普遍規則和法規的領域，玩弄規則、尋求變通也是遊戲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並不是不變的實體，本土化的追求應該扣緊這樣的變遷來尋求其實做邏輯。以目前台灣的社會為例，「如果我們從身心狀態的融合與變遷的角度入手，將會發現，不論是帶著西方範式的本土中國知識論述，或是傳統中國的知識論述，均不足以用來解釋當代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身心狀態。事實上，在西化的衝擊下，本土台灣人的身心狀態已產生極大變化，西方人身心狀態和傳統中國人的身心狀態兩者發生激烈的碰撞、滲透與融合。這不僅原始的西方的文化與價值觀在這裏以新的、扭曲的面貌出現，而且也使得本土文化變了味」（鄒川雄，1999：311-312）。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交會，角力，相互衝擊，彼此作用，不論是中西社會「原來的」面貌都走了樣。依本質論觀點，是要往回去尋找原來的樣貌，這是本文不贊成的作法，因為這種態度基本上並不接納變遷、融合，甚至於把變遷或者與外來文化之間經由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新社會視之為不自然或者不應該。本文認為本土化的工作是針對這個新的現象的實做邏輯進行掌握與分析，像鄒川雄（1999：313）所言：「這兩者在實踐中相生又相剋，並且相互滲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一個新的身心狀態，對於這個新的身心狀態的理解、詮釋及掌握，乃是推動本土化最重要的工作」。

### 三、鑲嵌性與去鑲嵌性對本土化研究的啟示

本土化研究最少有一個含意，就是學術理論必須和社會的運作邏輯能夠契合，這種要求對於第三世界的社會尤其顯得重要。經濟活動的社會鑲嵌性，以及經濟作為制度化的過程與本土化研究是同義詞。市場經濟的「去鑲嵌性」，除了表現出社會邏輯對市場邏輯的臣屬，也意涵著理論對社會的支配。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學術界，通常引進該學術界中心社會的思想和理論，並且不知不覺的，或者有意無意的把這些理論及其操作方式應用於自己的社會，對一些社會現象進行強加性的詮釋。因此關於本土化的討論，不能不牽涉到在地社會研究的問題，即使是從理論，概念或者分析架構的反省出發，最後仍然不能避免討論經驗研究的議題。當然，經驗研究的問題也不能不牽涉到其他層面的預設和主張。

在經濟社會學裏，有一個概念和本土化的思考有密切的關係，這個概念就是鑲嵌性（embeddedness）。鑲嵌性觀點自 K. Polanyi 提出以來，主要是強調經濟行動乃是一個制度化的社會過程，而 M. Granovetter 則指出這個社會過程應被視為人際互動過程，並在研究組織理論時強調人際互動產生的信任是組織從事交易必要的基礎，也是決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羅家德，forthcoming）。師

從於 M. Granovetter 的羅家德先生指出 M. Granovetter (1985) 試圖把兩個變項——人際關係連帶與信任——結合起來討論交易成本如何決定，更進一步地批判了「市場或層級」(market or hierarchy) 的分析概念。鑲嵌性的概念，指出經濟活動的基礎並非只在經濟領域，經濟活動有其社會性的基礎。離社會脈絡而自足存在的經濟理論，也許有他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但是卻與社會無關。關於本土化研究的目標，不外乎在於確定一個社會的實做邏輯、運作法則和理路，也就是掌握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一個政策，一項制度如果不了解這個社會底層的遊戲規則，那麼即使邏輯和架構看起來非常的漂亮，也未必有用。就像法國史學家 F. Braudel 所說的，理論像一條船，到底行不行，還是要放在水裡去看會不會沉下去，讓它航行於大海，看他究竟能走多遠？一個社會經濟理論，企業家拿去用在他的企業，如果行不通就要虧本，此時理論再美，也未必有意義，生意人是實際的。

關於鑲嵌的概念，K. Polanyi 在「鉅變」這本書裏所討論的意義以及實際分析的案例，對於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分析另有一種啟發性意義。廣義的說，K. Polanyi 主要是針對自律性與邏輯的市場經濟之出現的批評，他指出 19 世紀以前經濟行為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下，市場確實存在，但並不存在自律性邏輯的市場經濟。他深入的與經濟學對話並指出「唯經濟觀點的謬誤」，進而提出「實質經濟」的看法。<sup>5</sup>此處暫時先不討論該書精彩的歷史分析，最重要的是像涂爾幹所強調的「契約的基礎是非契約性的」，K. Polanyi 也認為市場交易必須依賴誠信和規律的集體財貨(collective goods)，而後者不可能由市場過程所提供(Block and Somers, 1989: 29)。他提出人類經濟活動裡最主要的制度結構：互惠、再分配與交換，稱為三種整合形式。從他所提出的互惠、再分配與交換三種整合形式，我們確認到經濟領域始終是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經濟行為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經濟行動的根源，或用經濟史學者的術語「動機」，是由各種非

---

<sup>5</sup> 可參考「市場經濟的批評與共同體經濟的建構——Karl Polanyi 理論的研究與深化」(張馭中, 1997)。

經濟因素所造成，而不單單只有圖利。這種經濟「鑲嵌」性格能確立，[主要是]來自於經濟活動與部落、群體之間的連帶關係（張馭中，1997; Polanyi, 1989）。他認為「人類經濟是鑲嵌在制度之中並受制度所影響，包括非經濟的制度是很重要的。宗教與政府可能和貨幣制度及減輕勞工辛勞的工具和機械的經濟結構與功能一樣的重要」（Polanyi, 1992）。相同的，經濟活動必須有所立足的社會基礎，不同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及其經濟運作型態各有不同，在生產與分配的方式上也就有不同的制度形式，因此在 K. Polanyi 看來「經濟其實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和與環境互動的結果，整個過程因不同經濟層次和不同社會條件，其經濟整合形式就不相同。以上這一段分析，對於本土化研究的啟發在於：理論的建構必須立足於個別的社會基礎，不同的社會，將發展出不同的理論，知識不能憑空建構。社會理論本來應該「鑲嵌」在（embedded）社會情境中，但是在西方理論進來之後，理論自行發展他的興趣，脫離了社會條件，這是本土化研究所擔心的。這就是理論與社會「去鑲嵌化」的問題。

K. Polanyi (1989:115-116)在關於市場經濟的討論中曾經指出，歷史學及人類學的研究都發現人類的經濟是附屬於其他社會關係之下的，經濟制度都是由非經濟的動機所推動，這也就是說經濟動機是起源於社會生活之中。但是 19 世紀以後卻轉向一個全新的方向，社會變成了市場社會的附屬品，經濟不再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經濟因素對社會生存的極端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結果。一旦經濟體制以單獨的制度、特殊的動機、且享有特別的地位等方式組織起來，這個社會就必須依此而改頭換面（Polanyi, 1989: 130）。對於這種現象，他非常的擔心倘若容許市場機制成為人類之命運、自然環境、甚至購買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導者，他就會摧毀這個社會（Polanyi, 1989: 151）。經濟脫離社會而按照自己的邏輯獨自運作，可以說是一個「去鑲嵌」（disembedded）的發展，經濟不僅僅按照自己的邏輯運作，甚至於反過頭來讓社會臣屬在他的邏輯之下，造成經濟邏輯對社會邏輯的殖民。這種「去鑲嵌」的發展，就像一個學術的研究架空社會脈絡，純粹從外來的、形式的理論硬套在一個社會現象的解

釋上，造成理論對現實的殖民，理論創造了現實或扭曲了現實。而這些情形，正好是我們在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時所要面對與檢討的難題。

#### 四、理論與研究：發展性策略

幾年前因參加中研院民族所所舉辦的質化研究的研討會，和東海大學的陳介玄教授合寫一篇「把生活世界放進來：三個台灣企業研究個案的比較分析」（張維安、陳介玄，1997），開始注意到台灣一些經濟社會學研究在所謂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具體成就，尤其是一些以關係網絡和經濟活動為議題的研究。<sup>6</sup>經濟社會學在台灣發展的這些年來，一直標榜著要建構或尋找企業活動的社會基礎，其所做的努力可視為一種本土化研究的工作。在這個領域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於台灣企業（經濟活動）研究的方向，漸漸的浮現出來，看不出持有什麼「明顯的」理論架構，也看不出是否「明顯的」挑戰著某一個理論的主張，但是這些研究在經驗世界裡踏實的進行著。在這些研究的過程中，漸漸的創造出關於討論本土社會的用詞、概念，對於台灣的經濟活動提出了經驗性的說明、解釋，隱約的在向既有的理論提出嚴肅的質問，不論他們本來是否意識到本土化研究的問題，這些研究無疑的都是本土化努力的範例，是社會科學紮根工作的具體呈顯。

我們發現這些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都非常的貼近「日常的生活結構」，<sup>7</sup>從與企業主的一起吃飯、一起唱卡拉OK，來瞭解企業的經營、籌資，外包制度中人脈的建立，工作的取得與相互調配。這些過程中所獲得的，都是這個社會中

---

<sup>6</sup> 在分析的材料上，本文無意以所有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為對象，順著場域(field)和狹義的鑲嵌(embeddedness)的概念，下文主要以「關係網絡和經濟活動」為軸線，並以質化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為取材對象。

<sup>7</sup> 當時分析的三個研究個案分別是：東海大學以高承恕教授所領導的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謝國興教授以及社會所謝國雄教授的研究成果。

非常根本的面向。例如關於台灣外銷導向的工業化之解釋，能夠從非常細緻的工作過程中，從外包制度的機制中來解讀。從企業主日常生活結構中的「實際的理由」，來看待那些從理論上出發，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行動與決定。這些深入的分析，作者們雖然沒有用來和本土化的議題對話，但是他們的見解在這方面的意義是重要的（請參考張維安、陳介玄，1997）。以下分別從理論與研究的關係，以及所使用的方法來加以說明。

談到理論與研究的關係，一方面要指出，熟讀其他社會理論對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要指出，其中所可能面臨的陷阱，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向。前者所要強調的是對於其他社會理論的閱讀與分析，對於在地社會的了解具有關鍵的重要性，例如，當我們看到西方社會的人在銀行排隊，排成一行時，則有助於提醒我們注意到我們自己排隊時排成多行的現象。韋伯從研究其他社會來對照西方人的特色，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從這方面來看本土化的研究不但不排斥對於其他社會理論的閱讀與跨社會的比較研究，反而認為通過對其他社會的理解有助於對在地社會特色和在地社會行事邏輯特質的掌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警覺到其中所可能面臨的陷阱：熟習既有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對於經驗研究固然有他一定的方便性，但是拿著西方（或其他）社會的理論、觀點與架構來進行在地的研究，卻容易有這樣的問題：在研究室裏面所構思的問題，也許在理論上有其一定的相關性，但是對於當地社會的理解卻不一定有幫助，甚至於是一種誤解，只看到理論所想要看到的證據，或者實證或者否證，<sup>8</sup>進而發生理論與社會的「去鑲嵌化」，甚至於「異化」，產生理論對社會現象在解釋方面的宰制（強加），因此研究者心中對於「理論和社會研究」這一層關係的態度與瞭解，對於本土化這個議題，具有重要的意義。以下

---

<sup>8</sup> 例如有些人從韋伯的理論出發來分析中國，結果只是作為韋伯理論的註腳，雖然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但是從這個理論的關心出發，所得到的卻只是做為一種「反面的案例」，請參考 Hamilton (1985)。

分別以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幾個案例來說明理論在「在地社會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研究者的態度。

過去一向以社會理論為教學、研究興趣的高承恕教授，在成立東海大學東亞社會與經濟研究中心後，投入台灣經濟活動或所謂華人經濟之社會基礎研究時，就宣稱不借用任何現有的理論或假設，避免以既有的架構套在經驗資料上。當然不借用任何現有的理論或假設，並非意指經驗研究與原來所閱讀或所熟悉的理論無關。與其說無關，不如說是間接的、啓示性的關係，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藉著原來理論的啓示，進入生活世界對行動者的實際理由的了解，再回過頭來重新形構原來的想法和觀念。這樣才能真正的去問一些日常生活世界中那些行動者認為重要和相關的問題。<sup>9</sup>談到所運用的理論，實際上理論如果有用，也要用之於無形，最多是用來做啓發看事情的敏感度，主要的目標是走向生活世界中，傾聽每一個行動者對其行動所持有的「實際的理由」，不必事前持有一定的理論或模型。把理論用來做為觀察社會現象的敏感性、啓示性的意義，也就沒有「用什麼理論架構」來研究經濟活動的問題，因為，從既有的理論出發，有他一定程度的方便性，但是也有它的限制性。這種有意識的避免各式各樣理論框架的支配，與解除長期西方理性社會之優勢模式，所帶來對於我們在研究自己社會時產生的一種無意識的比附作用，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研究努力的重要反省(張維安、陳介玄，1997)。

謝國興關於台南幫企業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說明：從西方理論出發，台灣的一些經濟活動的作法，看起來是非理性的，但是卻很有效，從在地社會脈絡的實作經驗出發，和借用其他社會的理論，確實不同。在台南幫企業的研究中，謝國興(1991；1992)所提出的「傳統的也是理性的」，其實就是這種在地理路的掌握。有時候我們聽到政府部門抱怨傳統行業不願意升級，看起來些企業主的作法是不理性的，沒有長久的規劃。但是許多訪談的結果卻告訴我們，升級，

---

<sup>9</sup> 這部分可進一步參考陳介玄教授所指出的「順結構發問與逆結構發問的對話」(張維安、陳介玄，1997；陳介玄，1999)。

在技術上不是問題，在資本上也做得到，但是事業是他們在做，盈虧由他們來負擔，如果不設身處地從業者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豈不也是拿著其他社會的、抽象的理論強加於這些業者的行爲嗎？台南幫企業的研究說明了，是否為現代的管理模式並不是問題。理論上理性或非理性，也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其辦法是否可行？是否有效？本土化研究強調對在地實作邏輯的理解。

理論與研究之間的關係，可以從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來作為分析的切入點。在訪問謝國興進行台南幫企業研究的方法時，他說：「史無定法」。當然不是史學家做研究「沒有」方法，而是說常因問題的性質，和我們所能掌握的材料來定方法。也就是說不同的問題和材料決定了不同方法的採用。提不同的問題，牽涉到可能使用的材料，也牽涉到所要運用的方法，甚至於影響到所可能得到的答案。用什麼樣的方法，這和所提出的問題是什麼，有密切的關連，所以說「史無定法」。本文提到的幾個本土化研究，多少具有這種不限於使用特定方法的態度。不過他們都有一個約略相似的作法，一邊研究一邊發展他們的問題，決定或調整使用的方法，提出觀點。這樣做，是因為研究的議題隨著進入問題的深度，採取發展性的修訂與調整。以謝國興的研究為例，他說在進行訪談之初，曾經事先擬好一份問題大綱，但事後發現沒有發揮作用，因為在研究室裡「想出來的」問題，受訪者可能兩句話就講完了，所以問卷式的大綱，雖然不是真的沒有用處，但只有在採取發展性的修訂之後，才能發揮長處。相同的，問題的掌握也是發展性的，能否順勢開發出問題是很重要的。這一點和只做一次的調查資料，有很大的差異性，所掌握的問題也不相同。

在研究的過程中，除了前述的材料、深度訪談外，最重要的是要有機會實際參與他們的活動，將人際網絡打開，才能敞開受訪者的心防，有些事情沒有熟悉到一定程度，不易有深度的交談，尤其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場合中，受訪者自然會提出許許多當初自己沒有想到的問題，而後再去追究，所得的材料也許更豐富。在「頭家娘」一書裡，高承恕（1999：16）指出了這方面的現象：對於一個社會現象的了解，不能夠從既有的架構或理論來切入，而須從現象本身

內在的理路來掌握，這種掌握似乎又不能夠只從一般的觀察來獲得，要進行深入的訪問，也不是能夠輕易的獲得，要使受訪者把一些生活的細節，以及處理各項事務的理由提出來討論，沒有取得受訪者的信任，那是相當不容易的。因此與受訪者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關係，是相當重要的。關於方法，他說至少在目前並不適合採取問卷法，也不適合掃街式的敲門拜訪，而必須透過參與研究人員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人際連帶來獲取訪問者的信任，才有可能真正深入受訪者的私領域來進行訪談、觀察與記錄。關係網絡的建構，在這個過程中具有其重要性。

從這些研究來看，真是無處不是資料，到處都是方法。由於這種針對問題提問與方法的採用都具有「發展性」調節的特質，「理論之用」也就變成是比較間接的，作為一種知識背景、作為一種看事物時增進敏感度的來源，這與理論作為一種研究的框架，有明顯的不同。

## 五、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

前面曾經討論過社會鑲嵌的意義，廣義來說關於經濟活動的解釋，只要考慮其社會文化因素的解釋，多少都和本土化的努力有關，本節為了分析和說明，取材方面以狹義的社會鑲嵌為基準，也就是說經濟行動是在人際關係網絡內的互動過程中作出決定的（羅家德，forthcoming）。如前所述，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雖然檢討之聲不斷，但是卻也有一張還不錯的成績單。這些年來，學者們作了許多關於社會實體的反省、小心理論和研究架構的使用，細心的從社會中提煉問題，從社會脈絡中尋找答案，並解答社會現象發展的理路和實作理由，這些均可稱為本土化研究的成績。以下取材僅以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之社會學分析為例，進行討論。

在過去幾年中，東海大學的陳介玄教授針對企業研究做過相當系統的研究。例如，針對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基礎之分析中，提出了一些從在地研究中

所提煉出來的概念：擬似家族團體連帶、情感與利益加權關係，包容式行政以及勤勞主義等幾個主要的概念。在擬似家族團體連帶方面，他一方面援引親族結構及親族連帶作為社會組織結構的核心論述，另一方面則分析其「擴大的相對封閉體系社會」性格，他認為親族關係之內的連帶，可以同時包容情感性及工具性而不悖，因而仍然可以在現代社會運作。在業界常看到的班底無法完全來自於親族團體的成員，但是自己人意識、貼心感、信任感卻是企業主所需要的，此時擬似家族團體連帶即是再造這種初級團體的不二法門，由這裡可以洞悉「擬似家族」在中小企業中仍是重要的人際互動原則。

在情感與利益加權關係方面，陳介玄針對人情、倫理、工具與利害四種關係做了深刻的分析和分類，此一概念同時涵蓋了人情與利益，因不同的狀況在兩端滑動它的比重，這與黃光國（1984：26）在分析形式關係與實質關係時所提出的混合性關係相似，但不同的是陳介玄把加權的概念加進來，用陳介玄的話說這種關係將不可能計算的東西和可以計算的東西整合在一起，並在概念內涵上以加權的觀念描繪出整合的質變過程（陳介玄，1994：241）。這個概念可以和「擬似家族團體連帶」放在一起來，權數的多寡與擬似家族團體連帶的強弱成比率，兩者合起來相當能作為了解台灣中小企業的一個切入點。

高承恕的「頭家娘」研究，也是值得討論的範例。看這個名詞就知道是一個在地的用法，針對台灣經濟活動的發展，增加了「頭家娘」（作者不是用老闆娘這個字）的研究和了解，對整個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在台灣，頭家娘作為一個隱形的經理，在世界其他各處可能是相當獨特的一種現象，在還有票據法的時候監牢裏坐了許多因為空頭支票而被逮捕的「董事長」，她們可能是先生的人頭，這種現象可能也是台灣所獨有。這個議題的深入，對於了解台灣經濟活動是重要的。高承恕沒有應用巨型的理論和架構，從觀察頭家娘們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探問他們奔波操勞家庭與企業之間的想法。運用舊識，透過深度訪談與個案田野調查，來記錄頭家娘參與經濟活動所扮演的角色與工作內容，以及她與頭家（企業主）、員工之間的互動內容；同時觀察頭家娘

在家庭生活領域中，與頭家（丈夫）的動態互動關係。此外，頭家與頭家娘的對話也是研究的重點，這些對話內容本身是思考深層社會文化結構的重要線索，在訪談的基礎上，可分別從頭家與頭家娘的觀點，來瞭解兩者的互動過程，以及其所蘊含的社會經濟文化意義（高承恕，1999：14-15）。書中的問題意識和方法都是討論本土化研究很好的範例。

在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面，關於台灣「外包制度」的研究也是一個相當本土化研究的範例。以謝國雄關於外包現象的研究來看，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相當重視對於在地邏輯的發掘，理論的主張和見解在整個研究的進行中，並沒有被拿來當作進行研究的尺規，如果有對話，也是採取比較間接的方式（也許也可以稱為比較根本的方式），這是一個採取「貼近社會生活世界的研究方法」。謝教授以及一些其他學者對外包制度的研究，相當程度的說明了台灣經濟發展的祕密。從這些相關的研究中，我們應可以了解到「客廳即工廠」對於台灣早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黑手變頭家的過程中，了解到許許多多中小企業老闆的創業機制，例如外包頭如何運用其所經營的人際網絡作為創業的資本。「從對台灣外包制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家庭部門（家庭工廠及家庭代工）是透過外包制度中的分工（將細分過的工作送至家庭部門而不是將勞動力招募至工廠）而被整合進資本主義體系。其主要的結果是動員了產業後備軍」（謝國雄，1991：179）。這些機制的提出，可說是道出了台灣經濟競爭力的祕密，對於瞭解這一段台灣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除了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之外，一位人類學家在鹿港所作的田野成果，也非常具有本土化的色彩，他的研究成果說明了外籍學者的研究，一樣可以在本土研究的成績單上有漂亮的表現。「在鹿港做生意」是一篇早期的人類學家的作品，一篇相當深入的指出當地人做生意的具體考量與社會關係思考的文章，作者雖然沒有說是一種本土化的研究，但卻是一個本土化研究的範例。例如：對於鹿港這個地區的經濟關係，DeGlopper（1972）以田野資料指出親屬，同鄉，同學，特殊的私人關係的重要性。為了瞭解經濟關係何以採用這種方式，進一

步去瞭解人際關係與人際連帶的類別是很重要的，這些進一步的會和信用的建立有關。這篇對於台灣經濟活動相關的人際關係，信任進行細緻分析的人類學研究的佳作，雖說是早期，但對於今日台灣的經濟活動之瞭解，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指出純粹的經濟理性並不是影響經濟關係的唯一因素，信用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他細緻的對於鹿港鎮裡各種交易的方式，考慮的因素甚至於支付工具的不同，都有深入的分析，可成為本土化研究的代表作。

## 六、結語

本文以本土化研究作為議題，以經濟社會學中關於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之研究作為例，延續了筆者過去的觀點，認為本土化不應在本質論的漩渦裡打轉，甚至於根本應該重新思考所謂實體。社會實體的意義，場域、關係、慣習在這種情形下被提出來。此時，任何新的事物的加入，都會使得整體的關係與運作發生變化，而本土化便是掌握這種新生成現象的運作理路，以及與過去運作邏輯的千絲萬縷。理論與社會需要有鑲嵌性，這是經濟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觀念，離開社會談社會理論，不但不恰當，這種「去鑲嵌性」反而容易造成理論對社會的強加或扭曲，就這方面來說，經濟社會學的基本關懷與本土化研究的目標是相當一致的，其中鑲嵌與去鑲嵌，對本土化研究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以關係網絡與經濟活動為議題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對於「社會鑲嵌與本土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 參考文獻

- Block, Fred and Margaret R. Somers (1989)「導論：超越唯經濟的謬誤——卡爾·博蘭尼的整體性社會科學」(石佳音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Bourdieu, Pierre and Loi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8, 《實踐與反思》。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Calhoun, Craig(1993) “Habitus, Field, and Capital: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Pp.61-88. Craig Calhoun et al eds: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Glopper, Donald (1972) “Doing Business in Lukang.”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milton, Gary G. (1985) “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Negative Questions i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 187-211.
- Hamilton, Gary G. and Wang Zheng (1992) “Fei Xiaotong and the Beginnings of a Chinese Sociology.”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 translation of Fei Xiotong's Xiangtu Zhongguo*.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Polanyi, Karl (1989)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黃樹民等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Polanyi, Karl (1992)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Pp.29-51.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eds by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Shieh, G. S. (1992) *"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 Swedberg, Richard (1987) “Economic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Current Sociology*, 35(1): 1-221.
- 李毓卿 (1997)《知識再生產與制度分析：以經濟學社群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之鏞 (1952)《中國經濟問題探原》。台北：商務書局。
- 高承恕 (1999)《頭家娘：台灣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馭中（1997）《「市場經濟」的批判與「共同體經濟」的建構——Karl Polanyi 理論的研究與深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維安（1995）《文化與經濟：韋伯社會學研究》。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張維安、陳介玄（1997）「把生活結構放進來：三個台灣企業研究個案的比較分析」。《社會與經濟叢刊》，第一期，159-210 頁。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維安、楊凱成（1998）「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爭議：文化比較、社會邊界與社會實體」。《台灣大學考古學刊》，53: 57-80。
-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陳介玄（1995）《貨幣網絡與生活結構——地方金融、台灣中小企業與台灣世俗社會之轉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陳介玄（1999）「台灣企業及社會研究的社會學技藝」，《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
- 費孝通（1948）《鄉土中國》。上海：上海觀察社。
- 黃光國（1984）「儒家倫理與企業組織型態」，21-55 頁。《中國式管理》。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黃光國（1988）《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楊國樞、文崇一（1982）「序言」，楊國樞、文崇一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葉啓政（1998）「序」，收於鄒川雄著：《中國社會學理論》。3-8 頁。台北：洪葉出版公司。
- 鄒川雄（1998）《中國社會學理論：分寸拿捏與陽奉陰違》。台北：洪葉出版公司。
- 鄒川雄（1999）「身心狀態研究：一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可能方向」。《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系。
- 鄒理民譯（1991）《社會實體的建構》。台北：巨流出版公司。
- 蔡錦昌（1989）《從中國古代思考方式論荀子思想之本色》。台北：唐山出版社。
- 蕭旭智（1999）《從實體到關係：試述 Pierre Bourdieu 之實作理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國雄（1991）〈網絡式生產組織：台灣外銷工業中的外包制度〉，《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1:161-181。
- 謝國興（1991）〈從家族到鄉親：台南幫的資本累積〉，《思與言》，29(4): 261-294。
- 謝國興（1992）《台南幫企業集團的形成，第一階段：1920 年代-1950 年代》。國科會專題計劃成果報告。
- 羅家德（forthcoming）「人際關係連帶、信任與關係金融：以鑲嵌性觀點研究臺灣民間

借貸」。張維安編，《台灣的企業：組織結構與國際競爭力》。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Local Studies – The Studies of Quanxi Network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s An Example

Wei-An Ch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community of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has already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western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studies of Taiwanese society twenty years ago. Since that time the efforts of indigenization have gone hand in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olu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studi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particular the achievement of economic soci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mbeddedness. I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 Bourdieu, society, an individual, and a group in different fields constitute a dynamic relationship. Society is not considered as a reality composed of general rul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I argue, is to discover “the logic of practice” from social context. (2)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illustrates the fact that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not based on universal rules, but on the logic of social context. The idea of social embeddedness is similar to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tudies. Research within the paradigm of social embeddedness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tudies. (3)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addition to the theories of and empirical data from other societies, are helpful for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4) Analyses of four examples. Using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within the paradigm of social embeddedness, I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Key Words: indigen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embeddedness and disembeddedness

